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则是其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法宝”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诉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大革命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



□ 张圣华 杨国营

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毛泽东仍坚持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

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指示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方法论是调查研究取得实效的“挖掘机”

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相。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

地接近真相、发现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谓真相，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真相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这样做。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

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告诫党员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研究是让调查实现升华的“催化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

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毛泽东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



学面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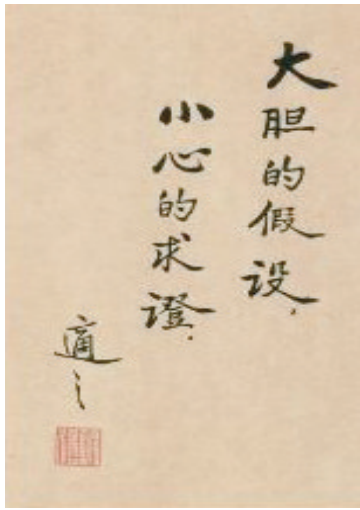
□ 魏建国

胡适（1891—1962），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方面。他所倡导的“习惯重于方法”的读书治学态度，他大力推崇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于今人求知问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勤、谨、和、缓”的治学习习惯

读书治学的技巧与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胡适认为做学问究竟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他在《治学方法》中提出，做学问的方法虽然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功法，这便是有“方法的习惯”，“科学方法并无巧妙，只不过是已养成治学的良好习惯的人的方法而已”。胡适也认为应该学习龟兔赛跑中乌龟拼命努力的精神，他认为“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习惯比天才更重要，“天才不够的人，如果用力，有方法的训练”，一样可以在学问上取得成就。

胡适强调读书治学须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第一点“勤”，也就是“不偷懒、不要懒”，良好的治学习习惯要多“用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第二点“谨”，也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做学问必须要细腻细心，如同用显微镜一般不放过学问中的任何一个小点，唯有此才“省去了无数的不必要的损失”，才能求得真知灼见的学问。第三点“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但却又“不要轻于相信大家”，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问精神，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敢于从实际问题与已有经验认知中穷究新学问。第四点“缓”，不仅是证据不足时的暴而



不断，更是“动手”去找寻新材料以求佐证，胡适认为“书本子的路”大都行不通，做学问必须要善于观察分析实际生活，“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中的事物混作一片”，这才是做学问的真方法。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认为无论什么科学都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所谓做研究就是去解决已经发生且有必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古今中外做学问但凡有所建树与成就者，动机和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研究的“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做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从研究动机到研究目的之间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会因“困难问题”的不同，时间上会有长短之别。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对治学方法简明扼要的概括。胡适回顾自己二三十年的治学之路，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说：“要大胆

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胡适不仅因这“十字治学真言”受益匪浅，也常常向青年们讲述，总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了解并践行。

胡适详细阐明了“大胆的假设”及其证明与否定。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困难”与问题出现的时候，研究者或学问家总会不自觉地进行假设，并且提出若干的解决方案。当然知识、经验、学问不同的学问家，提出的假设与证明的结果也会有差异。但是，无论是“大胆”还是“小胆”的假设，基本的目的就是能否得到证明。由此，做学问提出假设之后，最要紧的就是找寻材料与证据，而要寻找证据与材料则须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

“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修正”的治学自觉

治学总要有一点敢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方能求得真知灼见。胡适认为，没有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应用科学的地方在于其不能随时以实验结果纠偏纠错。因此，他提出科学研究务必要有治学的自觉，即“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塑造一种“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胡适以1948年美国大选的民意测验为事例指出，科学的方法不一定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错误的结论也并不意味着方法错误，而只是用方法的人用错了方法，缺乏自觉的批评与自觉的检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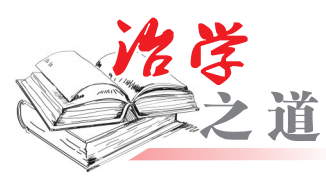
胡适还提出了做到治学自觉的方法。他提出：“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

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要形成这种方法的自觉，就要善于考据，不仅要审查证据的可靠性，也要审查证据与求证的关联性，更要时刻检讨自己。

“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的治学技巧

材料之于治学是极为重要的。胡适非常推崇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的动物譬喻，即“蜘蛛式做学问的人”，能够把内在的材料外化并织成很多很好看的网；“蚂蚁式做学问的人”，只知道搬运材料而不懂得研究利用；“蜜蜂式的学问家”，汲取百花精华加工后酿成蜜糖，堪称“做学问人的最好典范”。材料直接帮助或者限制做学问的方法，材料的不同又决定了学问的高度与深度。因此，胡适明确提出要“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这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技巧。

善用材料是做学问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条件。胡适认为，无论个人研究，还是团体研究，做研究取得好成绩的通用经验是，要有“直接的研究材料”“能够随时随地扩张材料”“扩张研究时所用的工具”等3个条件。因此，他提出做好学问，必须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善于运用治学方法获取新材料，也要“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如此，才能找到研究的新证据，才可以使研究有新的进步、新的发现。



在东亚地区原产地规则对我国产业地位的影响

□ 佟家栋

21世纪以来，伴随全球价值链长度缩短、内化的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再次兴起，很多国家竞相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形成了复杂的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网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原产地规则变得非常复杂，企业为了满足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就会调整产品中间零配件的生产地点，影响一国在区域中的产业分工地位，进而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

优惠原产地规则作为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特征，随着重叠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其职能也逐渐与生产专业化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影响一国产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成新轩教授多年一直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原产地规则问题，有较深的造诣。最近，她的研究成果《东亚地区自贸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在区域中产业地位的影响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针对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运用国际投入一产出表及贸易附加值方法对我国在区域中的产业地位进行了测度。以此为基础，就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在区域中产业地位的影响机制和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通过完善原产地规则提升我国在区域中产业地位的政策建议。成新轩教授在对此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比如，优惠原产地规则增加了自由贸易区的直接成本、利益分配成本和管理成本；原产地规则促使区域中轮轴国产生产业集聚作用等。这些观点对于传统自贸区理论是比较重要的补充。另外，该书详细分析了原产地规则影响成员国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并从贸易流、投资流等

角度实证了原产地规则对我国产业国际地位的影响效果，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的统一。

该书依据研究的结论，提出了协调统一优惠原产地规则，构建合理、细化的原产地认定标准等措施，对于我国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了参考。该书从研究方法上做到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从研究观点上，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对学术界同仁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总之，这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